

我国“人口拐点”的文化解码与人口走势预测

杨 帆

摘要:“人口拐点”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一项世界性难题,但文化差异导致全球范围内尚无应对“人口拐点”的普适性方案。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以“家国同构”为表征的家国文化是保障人口再生产的稳定支点。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当代青年对生育意义的认知发生价值位移——生育服务于家族延续、社会世代更替的宏观价值对青年的影响弱化,个体价值偏好在青年生育决策中的影响力攀升。基于青年生育价值认知的结构化转向,国家需要调整生育政策制定逻辑,充分体察青年生育决策背后的现实约束与个体诉求,同时要考虑出生率骤降会通过改变人口结构对人口规模增长形成持续性抑制效应,提前施策防范“人口拐点”恶化为“人口危机”。不过,我国并非循迹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无需过度悲观地看待“人口拐点”的出现。随着主流生育文化的渐进转型,我国人口总数虽然可能大幅收缩,但有望从“人口红利期”过渡至“人才红利期”。

关键词:生育文化;个体化;家国文化;人口红利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6.04.020

一、引言:文化视角嵌入人口问题的必要性

人口问题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项普遍性难题,但全世界当前对此并无普适性的应对方案。在西方社会,很多国家也经历了人口转型,并发展出一些颇具代表性的解释性理论。不过,需要明确的是,我国的发展逻辑与文化的独特性使个体生育价值意义系统与西方国家民众的生育认知体系有所不同,生育决策逻辑也存在差异。我们不能套用基于西方经验形成的人口转型理论剖析我国的生育问题,从文化视角解构我国主流生育观的形成逻辑与变化趋向尤为必要。

短短几十年间,我国已经走过了西方国家历经几百余年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人口拐点”的出现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口发展的标志之一,具体表现为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人口自然增长率呈负值。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末我国人口总数为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①。这是自1960年以来,我国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标志着以老龄化与少子化为显著特征的“人口拐点”业已到来。此后,虽然出生人口规模在2024年略有回弹,但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023年^②、2024年^③和2025年^④仍延续了负增长趋势,死亡人口均超过出生人口,全国人口总数分别为140967万人、140828万人和140489万人。目前,全国人口总数长期的下降幅度尚不明显,但人口规模尤其是人口结构缓慢而深刻的变化,将对我国未来的社会治理提出系统性挑战。

我国学界对“人口拐点”成因的研究集中于外部因素对生育意愿的负向作用。既有研究常常基

作者简介: 杨帆,扬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扬州 225127; fanyang0829@163.com)

①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3年3月1日,第9版。

②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4年3月1日,第10版。

③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5年3月1日,第5版。

④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6年3月1日,第4版。

于“成本-收益”模型^①分析导致生育意愿降低的各种因素,并指出个体化兴起是生育水平降低的原因之一。“成本-收益”模型以及个体化的确是分析我国当代青年生育意愿低迷的有力理论框架,也是研究生育意愿的典型范式,但生育意愿既受到外部客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到个体主观认识的影响,且客观因素会内化为人们的生育主观认识,进而影响其生育意愿与行为。但现有研究范式侧重分析外部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制约作用,对生育决策背后的生育观重视不够,尤其是在我国的生育情境中,家文化具有异常强大的影响力,缺少从文化层面呈现青年对生育的认知变化则无法准确揭示我国人口转变的规律。

人们对生育意义的普遍认识构建出主流的生育文化,从生育文化视角剖析生育意愿走低的缘由,有利于深入解构生育决策的内在逻辑。但“生育文化的变化究竟选择哪一个方向,不是生育文化自身所能决定的,而是由社会转型的方向决定的……封建社会不会接受现代的生育文化。虽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反对多生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在农业经济时代永远不可能成为主流的生育观点。”^②换言之,主流生育文化的形成由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与文化传统共同塑造,而非生育文化自身的“自我决定”。因此,解析我国生育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历史与文化土壤中提炼本土逻辑:既要承认社会转型对生育文化的重塑作用,也要关注到传统生育文化的惯性。只有如此,才能深描我国人口转型的内在逻辑,从而有针对性地构建适配我国社会的生育支持体系。

二、我国传统生育观的文化根基

社会情境、家庭特征与个人观念会导致个体生育决策的分化,但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社会层面的主流生育观呈现出相对稳定性。我国传统社会长期偏重生育对于家庭的意义,“父母之命”可以直接干预子女的婚育行为,“传宗接代”成为生育的主要目的。传统国家治理体系依托伦理教化与法律规制两类制度工具,建构出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结构,完成家庭本位文化向家国整合型文化的拓展延伸,并在制度与文化双重作用下,建立起民众生育行为同家国文化之间的稳定联结。不过,生育对个体的意义随着个体化的深入发展逐渐改变,而我国当下“人口拐点”的来临也透视出生育意义系统出现了结构性变动。

(一) 家国层面的文化根基

原始社会的生育行为并不具有国家意义,而是一种自发秩序,人们生育的目的是产生更多劳动力并实现种族延续。生产力的进步与阶级的出现催生了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诞生,作为国家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人口依赖生育行为完成继替。故在表象上仅与个人相关的生育实则攸关综合国力,我国先秦时期已有古谚云,“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③。生育率的高低可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但个体在作出生育决策时并不会思考生育之于国家的宏大价值,只有在国家兴亡之时的关键历史节点,人们才有可能从国家视角思考生育的意义。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们在国家的号召下积极通过生育为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提供劳动力支持。

在现代社会,生育率不仅直接影响国家人口规模,也对劳动力供给、消费市场活力以及国家创新能力产生持续且深远的影响。过去几十年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增长模式依赖于庞大规模的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利,人口总量的减少首先将削弱生产要素的禀赋优势。此外,年轻人口通常具

① 宋健、郑航:《中国生育研究现状与问题——基于方法视角的观察》,《中国人口科学》2021年第5期。

② 张纯元、陈胜利:《生育文化学》,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③ 穆光宗、林进龙:《新时期中国人口学的发展方向》,《江淮论坛》2021年第1期。

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与阶段性消费需求,生育率的下降的确会减弱消费市场的活力,尤其是住房、教育、母婴产品等与家庭生命周期紧密关联的行业会受到更明显的影响。

相较生育之于国家存续与发展的宏大命题,对家庭运作的文化解码更有助于理解我国传统社会人口结构的稳固以及当下“人口拐点”的来临。观察我国民众千百年来的生育实践,生育对家庭和宗族的意义虽然几经变迁,但始终表现为提升宗族实力的现实需求以及延续香火^①的精神寄托。在宗族社会中,个体通过血缘关系融入宗族网络,宗族组织作为家国文化的基层载体,通过建置族田、义庄等集体财产为宗族成员提供互助式的家族保障^②。祖荫下的宗族成员在获得身份归属时,也被施以接续香火的责任。同时,社会还发展出丰富的象征体系来强化生育的意义——从诞生礼、冠笄礼到婚礼、寿礼、葬礼,生命周期的每个重要节点都被仪式化,不断确认着生育行为的神圣——这种人生节点的文化编码深植于群体意识,成为驱动人口增长的精神动力。

对生育神圣性的强调不仅体现在人们的现世生活中,也扩及人们对于来世生活的想象,构成了群体成员的普遍信仰。死亡是无常人生的必然终点,人们出于对死亡的未知与敬畏执着地追求血脉的延续。他们笃信,个体肉身的消逝并不代表灵魂的终结,子嗣将延续自我的生命,人们可以由此在精神意义上获得永生,此种文化心理机制成为人们对抗死亡焦虑的有效方式。即便对那些生前未能婚育的男女,家族也会通过“配阴婚”的方式确保子女在阴间的生活不至于孤苦无依。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在祭祀活动中担任主导地位,未能生育男性子嗣被认为无法圆满地完成通往死亡的礼俗,去世后也无法获得后人的祭奠。

在封建社会,民众之所以服从主流的生育价值观,与律令中十分严苛的强制性律文不无关系。以唐代为例,《唐律疏议·户婚律》将儒家的生育伦理上升为具有强制效力的法律规范,其中,三条核心规定强化了以家庭为核心的宗法制,也借此巩固了封建统治合法性的根基:其一,“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维持扩大家庭模式以维护孝悌为本的家庭伦理秩序;其二,“诸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以确保宗族血脉的纯粹性;其三,“诸立嫡违法者,徒一年”,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当以立法形式确立一些生育伦理为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规则,高度秩序化的生育体系便成为民众必须遵守的法定义务。世代代的民众通过社会性习得接受了大部分社会成员认可的生育意义,家国同构也逐步融入民众的社会心理与价值体系,使家庭伦理秩序与国家治理需求彼此呼应,以致家国文化成为我国民众生育决策的文化根基。

当家国一体的文化逻辑转化为具备约束效力的律令条文后,该套价值体系还以道德教化的形式形塑民众生育观念。刚性法律与柔性伦理依靠制度强制与风俗浸润,共同形成传统社会“多子多福”“男孩偏好”等生育文化。而刚柔并济的双重规范机制,使个体生育行为同时被置于伦理评判与制度规制的双重框架之下,生育由此被界定为个体面向宗族与国家的固有责任。法律依托公权力威慑形成制度性服从,道德依靠内在认同与社群舆论形成规范性服从,两套规范相互交融,共同构成约束传统生育选择的完整规范体系。

(二)个体层面的文化根基

如果说个体通过社会性习得受到家国文化内含的生育规范的规训,那么其基于自身需求而作出生育选择则是具有一定主体性和反思性的理性实践。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宗法制度的统治需要以及儒家伦理的道德规范,共同塑造出以“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为内核的生育文化,在传统生育文化之中,生育成为个体不可或缺的生命体验,也成为个体不可避免的责任与使命。未能生育男性

① “香火”本义指代祭祀仪式中使用的香烛与灯火,后衍生为子孙繁衍或者家族传承。

② 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4页。

子嗣不仅意味着宗族血脉的中断,也意味着个体社会地位的降低与晚年生活的无依,甚至预示着来世生活的惨淡。

就生存需求而言,在农业经济主导的社会形态中,男丁被视为创造家庭财富的重要人力支柱。自幼年时期开始,男孩便跟随父亲学习耕作技术,逐渐成为家庭生产劳动的主力;到了父母年老体衰时,儿子需要承担起赡养责任,确保父母晚年生活无忧。这种子代回馈亲代的反哺型代际关系孕育出我国传统孝道文化。而且赡养父母不单是社会伦理层面的道德要求,亦是历代律法明文界定的强制性义务。背弃孝道者,既会遭受乡里社会的普遍道德批判,还可能依据国法、族规受到相应惩戒。《孝经·开宗明义》提出的“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等论述,则将侍奉双亲视作孝的起点,而效忠国家、辅弼君主并完善自身德行,才是孝道的终极境界。由此,孝道伦理与忠君爱国的政治规范相互贯通,形成“忠孝一体”的核心价值体系。这套融合家庭伦理与国家治理逻辑的观念,推动传统家文化拓展升维为家国同构的家国文化,并深度嵌入民众的生育价值判断与生育选择过程。

此外,个体安全需求的满足也需要家庭通过农业生产活动抵御潜在风险的能力。代际经济循环的模式使“养儿防老”成为一种经过长期实践验证且符合经济理性的家庭策略,生育多个儿子意味着家庭劳动力的扩充和抗风险能力的增强。相比之下,“嫁出去的女儿”无法为原生家庭提供持续的劳动力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重男轻女”的经济理性。因此,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传统社会,能否生育男性后代直接关系到个人的晚年保障和社会地位。

当生存需求与安全需求得到基本保障之后,人们进一步从心理层面探求生育对个体归属需求的满足。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指出,生育行为体现了个体对家庭完整性的深层渴望,成年期的重要发展任务是通过繁衍对抗个体的停滞感^①。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生育同样使个人获得完整的家庭角色认同:男性通过生育承担社会期待的父职角色,女性则通过生育男孩稳固在夫家的地位。这种角色认同如此重要,以至于历史上出现了过继、纳妾等多种制度来应对无子问题。

我国熟人社会中的面子文化也提高了生育对个体的重要性。面子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现象,与讲求规则意识、强调“对事不对人”的现代法治精神并不合拍^②。但我国民众在乎“面子”本质上是一种期望受到他人尊重的需求,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处于较高层级的尊重需求存在暗合。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也认为个体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印象操纵”,以此“保护个人免遭与自己同一阶层的人的侵害”^③。在日常社会交往中,生育男性子嗣被视为维持社会形象的“象征资本”,男性子嗣的多寡影响着个体的声望与话语权,这在乡土社会的资源分配、纠纷解决等场景中均有所体现。无子者和不婚者经常处于人际网络的边缘位置,在社群中面临“绝户”的社会污名与道德责难。这种熟人社会形成的社会评价机制也足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促使个体将生育视为融入社会主流的必由路径。

三、我国青年生育观的嬗变逻辑

个体生育观受到生育文化的影响,而生育文化又是时代背景的投射。诚如作家余华结合自己的生命历程所写,“如果从伦理道德和处世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这六十年来社会变迁,那么家庭价值观的衰落和个人主义的兴起可以作为一条历史分界线,显现出同一个国度里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

① 爱利克·埃里克森:《童年与社会》,高丹妮、李妮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年,第246—247页。

② 周安平:《面子与法律——基于法社会学的视角》,《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4期。

③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0—73页。

界”^①。虽然余华笔下的这条历史分界线并无具体的时间节点,但我们大致可以将改革开放作为分隔点,管窥生育文化的变迁如何塑造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改革开放之前,人们以家庭为纽带形成社会关系的联结,个体诉求被置于家庭生活与集体生活之中,生育被视为个体与集体、他人的连接方式。改革开放之后,个体化的加速发展使家庭承载的社会功能逐步衰减,个人以个体为符号便能形成与社会的连接。

(一) 家国文化与人口增长的耦合效应

既有研究普遍认为,我国传统社会人口长期稳步增长,核心驱动来源于家国同构文化的外部牵引,但这一认知本质上是外在表现导致的认知误会。在传统专制集权社会,个体行动意志缺乏独立性,国家统治意志具备绝对优先性,公权力自上而下约束个体行为选择,强制要求个体服从统治集团的制度安排与价值导向^②。传统社会奉行崇公抑私的核心行为准则,要求私人利益服从公共集体利益。但此处的“公”具备层级化内涵:宏观层面指代天理纲常等抽象伦理准则,微观层面则是家长、族宗长老、国家君主等层级权威主体。这些主体依次构成由家庭、宗族到国家,由近及远、圈层扩散的差序性公共性体系,形成从小到大逐级延伸的双层公共价值逻辑。依据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个体与家庭、宗族圈层的地理与情感距离更近,相较于宏观的国家利益,个体生育决策更易受到周边近距离共同体利益的约束与引导。由此可见,驱动传统民众开展生育行为的核心动因,并非面向国家层面的宏观公共责任,而是维系宗族延续、稳固家庭发展的现实需求。这类生育动机虽然具备利他性群体特征,但仍是个体立足于家本位的局部私利,属于圈层内部的具有“小公”特点的私利。

从需求逻辑本质来看,微观个体生育诉求与宏观国家人口发展需求具备天然的内在一致性,这也是家国文化能够干预社会成员生育行为、促进人口增长的核心前提。二者的价值出发点、行动动机存在本质差异:个体生育决策立足私人层面的自身利益与情感需求,国家人口调控立足社会治理与国家长远发展的公共利益;但在人口再生产方面,个体与国家的目标导向高度趋同。就个体层面而言,生育是人类本能的繁衍行为,既能够满足生理本能、情感陪伴等需求,也可以依托子代抚育完成家族血脉延续、搭建晚年代际反哺的养老保障体系。就国家层面而言,人口是传统农业国家最核心的生产要素与治理基础:充足的人口基数能够保障农业生产劳动力供给、稳定国家赋税财政收入、储备国防兵源,维系基层社会秩序运转与国家长治久安。由此,个体自发的生育行为客观上承接了国家人口发展目标;家国文化因此成为个体到国家的价值传导链条,并成为引导民众生育决策的文化根基。也正因二者需求高度耦合,在我国传统社会阶段,人口总量变动始终依托个体自发生育行为运转,人口问题长期没有上升为国家专项公共治理议题。

封建统治阶层精准把握这一耦合逻辑,将生育制度上升为国家基层治理工具:通过国法与家法族规双重制度加持,赋予生育行为强制性道德约束与法律效力,搭建起自上而下的传统生育管控体系。这套依托家国文化建立的生育治理体系,形成了高效稳定的人口再生产模式,支撑我国在整个农业文明阶段长期稳居全球第一人口大国行列。即便遭遇周期性战乱、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损耗,我国总能快速完成人口修复与规模反弹,其底层根源正是家国一体文化权力的弥散性引导,稳定规范社会大众的生育行为偏好。

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阶段,传统家国文化与人口增长的固有耦合关系逐步解构,二者的内在逻辑关联随着生育率持续走低重新凸显,倒逼学界重新审视家国文化、个体认知与人口发展的内在关联。

① 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② 阎孟伟:《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与自由秩序——简评哈耶克自由理论与马克思自由理论的原则区别》,《新视野》2009年第4期。

现代化背景下,当代青年的生育决策存在明显的价值张力:一方面,传统生育责任伦理仍具备延续影响力,多数青年即便选择晚婚晚育,最终仍会履行生育义务,保障家庭代际延续;另一方面,个体化的兴起消解了生育的伦理义务属性,越来越多青年将生育定义为自主可控的个人基本权利,而非家庭与社会强加的道德责任,基于自我生活规划、个人效用偏好开展生育决策的观念逐步普及。

针对青年生育观念转型与全社会低生育趋势,国家已经完成生育治理思路的战略性转向:从过去严控生育数量的限制性政策,转变为鼓励适度生育的支持型公共政策,落地出台育儿补贴、普惠托育、个税专项扣除等一系列生育配套扶持措施。在微观家庭层面,传统大规模复合扩大家庭虽持续消亡,但中国特色代际互助网络并未瓦解;祖辈协助子代抚育的隔代抚养模式普遍存在,构成现代社会低成本育儿的重要支撑,弥补了核心家庭育儿压力,维系现代生育行为的家庭层面支撑。

(二)生育文化转型与人口下降的内生关联

现代社会中,个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使传统生育决策赖以运行的“权威-服从”机制逐步失效,传统家国文化自上而下约束生育行为的治理逻辑陷入现代性困境,这也是当前我国出现人口拐点、面临低生育风险的深层文化根源。在当代青年群体的生育决策过程中,家庭、宗族、国家的支配力日渐式微,个体的自主性显著增强。面对日益原子化的个体,家国文化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应当通过个体的价值认同得以实现,充分尊重个人的主体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代青年的生育决策彻底脱离家国文化的价值约束;从我国本土化现代化进程来看,家国文化依旧隐性作用于青年生育认知。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将西洋社会的文化形态概括为“个体本位主义”,据此批驳传统宗法制度“损坏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之“四害”^①。此后,个体本位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价值导向,推动我国开启以个体解放为内核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外部入侵催生民族危机,民族救亡上升为近代社会首要时代任务。特殊的时代背景,使我国本土化个体化发展区别于西方纯粹的个体自由逻辑,形成个体自由服从集体自由的独特范式。这一阶段的自由理念始终内嵌民族存续、家国安定的集体目标,与我国传统家国同构文化底层逻辑一脉相承;该价值导向成为革命时期及后续社会建设阶段的主流文化基调,也为我国集体主义社会文化的形成筑牢了历史根基。

作为现代性门槛的个体化包括“自然权利”与“道德自律”双重面相^②。我国传统生育文化体系侧重伦理教化,本身无法直接适配现代性个体化标准,二者存在明显的价值逻辑断裂。我国文化传统对“个体”的关注主要是“道德个体”而非“权利个体”,在生育制度中表现为将生育视为个体的“道德义务”而非“个人权利”。个体化对我国生育文化的影响突出表现为“生育义务观”向“生育权利观”的转变。这也解释了当代青年生育决策的内在张力:传统生育责任伦理仍存在惯性影响,但道德规范的外部约束力大幅弱化。多数青年逐步树立“为自己而活”的价值观,重视自我生命体验与现世生活需求,消解了生育行为千年以来承载的宗族延续、家国存续神圣属性。而青年群体完成从传统集体人格向现代觉醒个体的身份跃迁后,普遍将人口增长视作宏观国家层面的公共责任;仅当国家、家庭搭建完善的生育支持体系、消解生育后顾之忧时,青年才会基于成本收益理性权衡,做出生育选择。

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个体意识的崛起,并未造成个体价值与家国集体价值的彻底割裂。经典现代化理论提出,家庭现代化必然伴随价值重心转移,社会主流价值观从传统家庭本位的家庭主义,转向利益优先的个体主义^③。但我国生育文化转型现实印证了新家庭主义的核心论断:家

① 陈独秀:《陈独秀散文》,乔继堂选编,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1页。

② 孙向晨:《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文史哲》2017年第3期。

③ 康岚:《代差与代同:新家庭主义价值的兴起》,《青年研究》2012年第3期。

庭的价值功能与文化约束力不会被个体利益完全取代^①。当前,国家与家庭不再依靠制度、伦理强制干预青年生育决策,但集体主义文化底色、中国式代际反哺传统仍对青年生育选择具备显著影响。家国文化的作用路径发生根本性重构:传统模式下,个体被动承担面向家庭、国家的生育伦理责任;现代新模式下,逻辑关系发生倒置,家国与家庭承担生育前置保障责任,成为个体开展生育决策的外部支撑条件。简言之,生育决策的底层逻辑,从“个体对家国负有生育义务”转型为“家国主动为个体生育提供保障支撑”。

四、文化视角下我国人口走势预测

任何一项对人口走势的预测都无法精准无误,即便是由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的《世界人口展望》,也不断更新人口预测结果并采用更加精密的预测方法。2024年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预计中国人口2100年将不及现有人口总量的一半,下降至20世纪50年代的人口规模^②。我国生育率之所以远低于预期,其原因在于生育文化转变的速度之快与程度之深均无法通过数据予以量化。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视角重在强调对人口走势的预测必须考虑生育文化因素,可以从文化角度推测人口的大致走势。

(一)短期预测:人口结构将会缓慢偏移

人口规模的变动存在代际更替的滞后性,当前急剧下降的生育率不会立即牵动总人口数量的显著降低,但会通过人口结构的缓慢偏移波及几十年后的人口总数。人口学理论主张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的更替水平,即一名育龄女性平均生育2.1个子女,才能确保世代人口平稳更替。我国总和生育率一度居于高位,但自1992年低于2.1之后就一直在更替水平线以下且持续下降^③。前期的生育率下降共同导致2022年“人口拐点”的出现,然而单一时点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并未导致总人口数量急剧减少。生育率的时滞效应发出警示,我国近几年生育率的断崖式下跌可能在几十年后触发人口总数的指数级下降。

诸多学者指出,生育环境等外部因素的恶化是当代青年生育意愿低迷的主要成因^④。但我国历史上不乏生育环境极其恶劣的时期,当时生育率下降的幅度却不及当下^⑤。因为那时的主流生育观仍根植于侧重宗族意义的生育文化之中,或者说,彼时人们即便关注了生育行为中的个体需求,也仅聚焦于诸如养儿防老等方面的生存需求,与当下人们对心理归属等高层级的需求相距甚远,青年生育决策时关注个体精神需求是新近才出现的变化。由此而言,生育文化重塑才是影响青年生育意愿的关键。

随着生育研究的持续深入,部分学者指出个体化导致当代青年生育观的转变成为我国“人口拐点”出现的理念源头。有学者断言,个体化是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确立的现代性理念^⑥。个体化的影

① 阎云翔、杨雯琦:《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

②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d/site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d/files/files/documents/2024/Jul/wpp2024_summary_of_results_final_web.pdf, 访问日期:2026年2月24日。

③ 王军、刘军强:《在分歧中寻找共识——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政策研究与演进》,《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2期。

④ 风笑天:《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影响分析与社会学意义——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民论坛》2021年第32期。

⑤ 米红、李树苗、胡平等:《清末民初的两次户口人口调查》,《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⑥ 冯建军:《超越“现代性”的中国教育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视角》,《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响之深在我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表现为社会关系的剧烈变动,“Z世代”从宗族制度和亲属网络中抽离,更加关注个体需求在社会交往与建立亲密关系时的决定性作用。婚育不再以初民社会或小农社会中辅助生产劳动为主要功能,传统生育观念也受到“不婚主义”“丁克家庭”等现代性生育理念的冲击。目前,我国育龄人口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口队列,该群体受到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程度远高于即将成为生育主力的“Z世代”群体。虽然个体化对众多青年的生育观念产生影响,但实证研究表明,部分青年在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下依然具有较高的生育意愿,制约他们生育选择的并非个体化等主观认识因素,而是生育成本等外部客观因素^①。此外,我国人口能否形成稳定的世代更替,还取决于生育政策是否顺应了个体的需求以及对新型生育观念是否足够包容,比如,法国在制定生育友好政策时并不拘泥于传统家庭形式,营造出以尊重个体多元需求为本位的生育友好型社会文化氛围,以此实现了结婚登记数量降低却基本维持世代人口平稳更替的目标^②。

在传统生育观仍占一席之地的当下,结婚登记人数的走向也是我国人口规模变动的前兆。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结婚登记对数自2015年的1224.71万对^③锐减至2024年的610.6万对^④,十年间结婚登记人数下降幅度已经超过五成。当然,随着“性—恋爱—结婚—生育”四者关系逐步松绑,出现了一些新型婚育观念,动摇了结婚与生育的捆绑关系,但选择这些新型生育模式的群体并不占多数,短期内对我国人口总数不会产生明显影响。因此,结婚登记人数的快速下降成为我国出生人口仍将降低的先兆,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短期内不容乐观。

但我们也不必过分悲观,生育率下降并非必然引发人口危机,反而可能开启新一轮的人才红利窗口,成为我国从数量优势的人口红利向质量优势的人才红利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我国以往的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使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的社会抚养压力减轻,但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减少与老年人口数量的激增,使我国的人口红利难以维系。面对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可能,我国应当抓住人口结构变化的特点,改变以往在国际贸易中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不平等国际分工地位,提升劳动者素质并优化产业结构,以生育率下降为契机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迭代升级^⑤。

(二)远景展望:人口规模或将大幅收缩

在生育文化发生巨变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个体化对生育意愿的巨大影响已经通过近几年骤降的生育率初步显露出来。对此,有人预测我国的人口总量将在“人口拐点”之后呈递减趋势,直至生育率降到谷底才会趋于缓和^⑥。还有人更大胆地预言人口基数较少的国家或地区会因为生育意愿的下降走向消失。比如,梁启超早在百年前便在《中国道德之大原》中通过推演认为,“法国之亡不及百年,可立而待也”^⑦,在他看来,欧美文明必因“个体主义”与“现在快乐主义”的盛行而泯没。如今,大洋彼岸的东亚文化圈也步入欧美低生育率的后尘,那么,我国是否也会如西方国家一样面临人口危机?

① 李婷、郑叶昕、闫誉腾:《中国的婚姻和生育去制度化了吗?——基于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的发现与讨论》,《妇女研究论丛》2022年第3期。

② 侯慧丽、王广州:《福利保护还是能力建设:无婚生育的生育率回升作用及其对中国的意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③ 《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https://www.mca.gov.cn/n156/n189/c93378/content.html>, 访问日期:2026年2月24日。

④ 《2024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https://www.mca.gov.cn/gdnps/n2445/n2451/n2458/n2681/c1662004999980006189/attr/400985.pdf>, 访问日期:2026年2月24日。

⑤ 楼俊超、金哲汗:《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国际分工的不平等交换视角》,《经济学家》2024年第10期。

⑥ 张现苓、翟振武、陈卫:《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趋势预测:全国及城乡人口变动分析》,《人口研究》2026年第2期。

⑦ 梁启超:《少年中国与道德大原:梁启超文选》,王德峰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23年,第191页。

长远看,未来的人口走势有两种可能的趋向:一是出生率无限下降直至跌入谷底,二是出生率总体呈下降态势但下降速度减缓。第一种预测并非杞人忧天,当生育环境恶化时,如果个体的生育主体性得不到有效彰显和尊重,那么个体的生育意愿会持续下降。为了避免第一种情形下“人口危机”出现,国家理应继续完善生育友好政策,为有意愿生育的个体提供全方位支持,并以此形成对低生育意愿个体的鼓励。而且,在“人口拐点”出现释放出传统生育文化转型信号的当下,国家应在制定生育政策时充分考虑个体生育决策的微观逻辑,在减轻个体生育压力的同时放大生育对个体的意义,确保生育文化的平稳过渡。

与第一种担忧相比,第二种预测发生的可能性更大。随着生育文化转型的逐步完成,当新型生育伦理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时,我国生育率下降的速度或将趋缓,不会无限地萎缩下去。从国际经验看,即便在那些有着深厚家庭传统的东亚国家,如在日本、韩国,青年群体在现代性思潮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更关注生育能否满足个体需求的新型生育文化^①,且人们对生育的道德评价发生逆转,但其整体生育水平也并未无限地降低直至为零。而且在我国,仍有诸多青年认为结婚生子是实现个体人生价值的方式,部分地区仍然信奉“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因此构建涵盖全生命周期的生育友好政策,比如完全放开生育数量限制、实施强有力的生育补贴、延长育儿假等政策,不仅能够贴合这些群体的现实需求,还可以延缓生育率下降的速度。

实际上,我国人口下降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生育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融合程度的影响。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生育蕴含的养老功能正在弱化,而其情感价值和精神意义反而得到强化。这种转变虽然降低了人们对生育数量的追求,却增强了对生育质量的重视。当代父母普遍愿意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情感,当“精养模式”成为社会共识之后,一种新的生育平衡便会应运而生——虽然每个家庭生育子女数量减少了,但绝大多数人仍然会选择生育,从而保证人口不会无限下滑。

尽管传统的生育伦理影响力有所减弱,但传统生育文化在我国的影响力很难迅速消失,故对我国人口走势的长远预测也不能完全以其他国家为参照。当前我国生育率的下滑,本质上并不代表传统生育文化的消亡,而是传统生育文化进入了历史转型期。传统生育文化中那些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部分,比如对数量的过度追求、对男性子嗣的偏执重视,正在被摒弃;而那些契合现代人精神需求的核心要素,比如亲子关系的情感价值、家庭延续的传承意义,则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获得新的生命力。人口演变轨迹的背后,体现了我国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强大韧性,它既不像某些悲观预测那样会彻底瓦解,也难以像乐观者所言,完全回归传统的高生育模式,而是在变革与延续的张力中逐渐塑造出一种新型的生育伦理。传统生育文化的调适过程直接决定中国人口最终稳定的规模与结构,其影响之深远,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

人口统计学家也难以否认,再精密的统计分析在人口走势的预测过程中也无法做到完美^②,而人口社会学也无法对未来的人口规模给定一个确切的数字作为答案。在前工业社会,人口预测的不确定性主要源自人类对出生、死亡、迁移三大人口变动要素极其有限的掌控力。科技的现代化增强了上述三项要素的可预见性,但是个体决策的不确定性又在现代化浪潮中升高了人口预测的难度。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同样将出生率、死亡率和国际迁移作为人口走势预测的三项变量,但以往对出生率的预测过于依赖其他国家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相关数据,将生育文化预设为各国具有普遍共性的因素,致使对我国人口的预测远远偏离实际走向。在普遍存在误差的人口预测模型中,生育文化的变动加

① 王颖、王亚光:《东亚地区人口结构转变中独特的低生育模式及成因》,《人口学刊》2024年第5期。

② 乔晓春、江益:《对近年来中国人口统计学学科发展状况的评述》,《人口与经济》2008年第6期。

大了人口预测的不确定性^①。生育文化对人们生育决策的影响难以量化,似乎难以成为人口预测的变量,但是忽略文化因素必然削弱人口预测的准确性。从文化的视角对人口走势进行预测,其意义在于强调人口预测模型的构建需要将生育文化纳入变量之中,未来人口规模的大致走势可以从文化视角寻到迹象。

五、结论和讨论

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国文化构建了一套独特的人口发展逻辑,在数千年历史中形成了家国文化与人口增长的耦合机制。我国传统生育文化的韧性延续至今,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鲜明特征,成为支撑我国人口稳定的核心内生力。然而,个体化进程使生育的意义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动,当代青年以个人的现世需求作为生育决策的行动准则,致使我国长期稳固的生育文化遭遇现代性困境。传统生育观偏重生育对国家与家庭的价值,这难以成为当代青年生育决策的主要动力,由此出现人口下降的伴生现象,来势汹涌的“人口拐点”促使我们审思当代青年生育决策背后的微观逻辑。运用文化社会学的方法解构生育文化的转型不仅是从我国文化谱系中寻求青年生育观变迁的文化逻辑,还将我国生育文化置于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化图谱中,清晰展现出我国人口转变的历史脉络与独特路径。

自我国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生育对个体的意义随着个体化潮流日益高涨,传统生育文化在生育决策中的话语权力也在消减。面对我国人口变动的趋势,我们无法回避当代青年已经悄然发生改变的生育观。亘古及今,生育的意义系统常由国家需求、家庭需求以及个体需求三重意义构筑而成,当代青年在生育决策过程中对生育意义系统的认知发生了价值偏移——生育的家国意义位阶下沉,而生育对个体的价值在生育决策中的影响力攀升。当下,生育相关的“养儿防老”抑或“祈求来世幸福”等意义不再被充分认同,当自我实现的需求取代家庭和国家的需求成为生育制度的核心价值时,生育行为便从人生的必选项转变成了一种可选项。

为了重新定位生育行为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价值坐标,我国应当顺应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体察当代青年生育决策背后的个体需求,在转变思维的基础上及时出台行之有效的生育友好政策,以此预防“人口拐点”恶化为“人口危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提醒我们,运用公法的强制手段对生育进行管控需要构建与之配套的回馈机制,过度的管控以及支持机制的缺位可能会加剧人口问题。我国新近出台的一些政策已经体现出了制定思路的变化,但政策的支持力度与覆盖广度仍有待提升。短期看,我国生育率下滑的趋势难以扭转,但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我国人口规模在大幅收缩后,其下降速度或有望放缓,前提是我国能够在“人口拐点”来临的背景下迅速调整诸多与生育相关的政策,诸如“全面两孩”“三孩政策”等逐步放开生育的举措已是有益尝试,只不过放开程度与放开时机有待实践检验,凡此种,不一而足。

^① 张震、李强:《不确定性对人口趋势研判及决策的影响——以中国人口为例》,《人口研究》2021年第1期。

Cultural Decoding of China's "Population Inflection Point" and Projections of Population Trends

Yang Fan

(Law School,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127, P. R. China)

Abstract: China's population has long ranked among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but in 2022, China's population faced a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the number of deaths exceeded that of births, resulting in a negative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This marks the first time since 1960 that China's population has experienced negative growth, signaling the arrival of its "population inflection point"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an aging population and declining birth rates. The "population inflection point" represents a global challeng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foundations mean there is no universal solution to addressing it. Therefore,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China's "population inflection point"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using the approach of cultural sociology to predict its population trends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methodolog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he idea that people universally adhered to is that they have profound commitment to their family and nation, which served as the cornerstone for population stability within China's cultural system in ancient times. However, the notion that people engage in childbirth for state interests may simply be a misconception. The fact proves to be that Chinese individuals tend to make fertility decisions based on family and clan interests. Feudal rulers utilized Confucian ethical philosophy to link family and clan interests with state interests. For instance, Confucian culture advocates three cardinal principles for people's daily behavior, that is, ruler guides subject, father guides son, and husband guides wife. Besides, feudal rulers promoted the spirit of dedication for their nation and family through both legislation and moral preaching. Even if feudal rulers proclaimed that a nation must exist before there can be a family, people's fertility decisions are still based on individual, family or clan needs rather than state interests.

Over the cours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the rise of individualism in China, contemporary youngster's attitudes towards childbearing have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in value. The significance of childbearing to family, clan and nation has declined, while individual values have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in fertility decisions. Amid the decline of family-and-nation culture, the state should prioritize the value of childbearing for individuals and then optimize fertility support measures, rather than impose obligations on youth to deal with their decreasing fertility desire, thereby prevent "population inflection point" from degenerating into "population crisis" through the gradual change in population structure. As China is not following the Western path of modernization, there is no need to be overly pessimistic about the emergence of "population inflection point". As mainstream fertility values gradually shift,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is likely to shrink significantly in the long run but has the chance to gain "talent dividend" instead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Keywords: Fertility culture; Individualism; Family-state culture; Demographic dividend

[责任编辑:王苏苏]